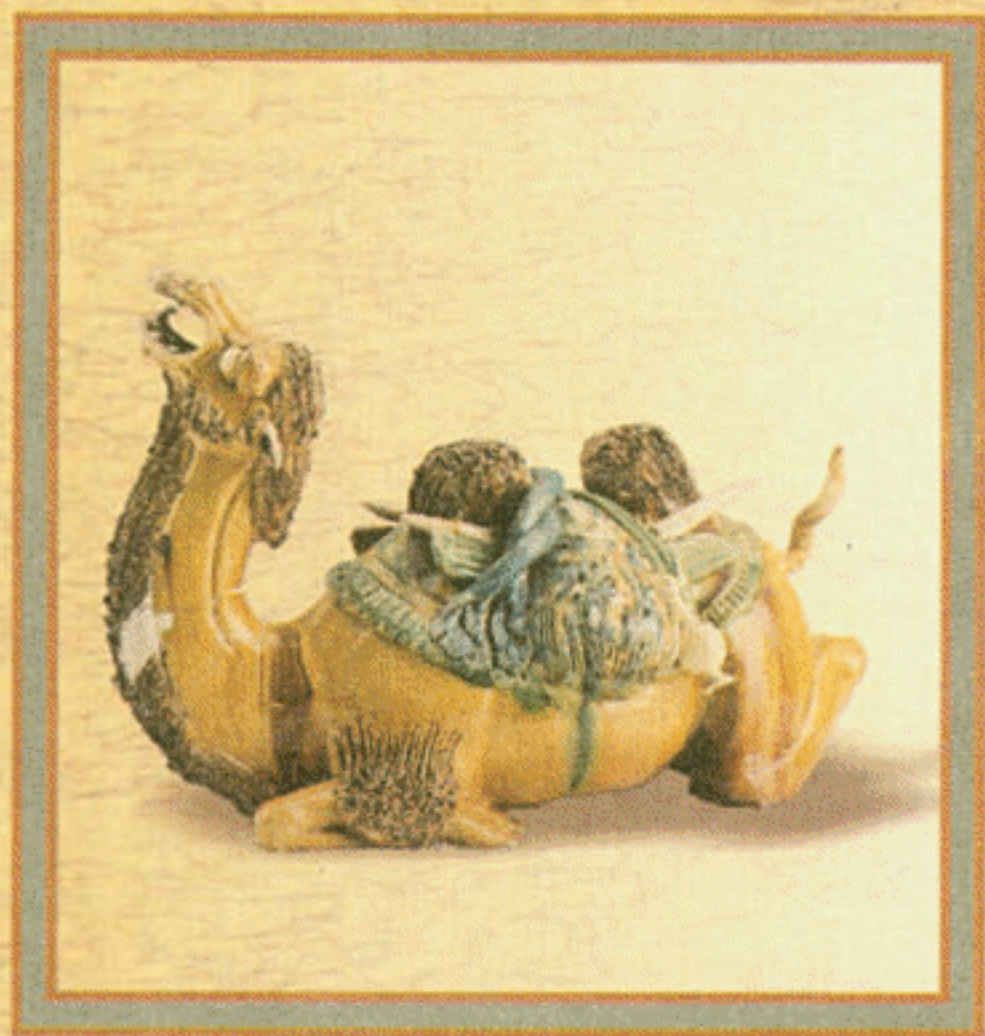


西安文物考古研究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成立十周年纪念



XI'ANWENWU
KAOGUYANJIU

陕西人民出版社

论外来文化对瓷器发展的影响

王长启

唐代对外开放,外交活动活跃,唐长安城内外来人口很多,有突厥人、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天竺人、回鹘人等,应在缘万人以上,甚至超过 10 万^①。受胡人影响,唐长安城内胡风大为盛行。“大批流寓而来的波斯人和粟特人,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那些流亡的王室贵族还带来了许多手工艺匠人。这些人在长安生产和制造波斯风格的美术工艺品,使其广泛流行”^②。“胡风”影响了唐代的生活生产,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国瓷器的发展就与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分不开。自创烧以来,瓷器就受外来文化影响。佛教传入中国,瓷器就有佛教文化的色彩,如三国时期越窑谷仓上除楼台亭阁、人物、飞禽走兽外,还有佛造像^③。两晋南北朝瓷器的外来文化特色增多:西晋南京中华门外长岗村晋初墓出土青瓷釉下彩盘口壶,高达 10 多厘米,堆塑有异兽、羽人与佛像,是佛教与神仙术题材;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瓷莲瓣罐^④与李云墓出土的黄釉彩莲瓣罐^⑤上的莲瓣纹、忍冬纹都是典型的外来纹饰;南朝齐明三年(公元 566 年)武昌何家大湾刘凯墓和梁代南京林山墓出土的莲花尊,北齐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北朝源氏仰覆莲花尊^⑥,其上面的纹饰除仰覆莲花外,还有飞天、菩提树叶等,华丽脱俗,受佛教艺术影响。此外,瓷器受到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在长沙窑遗址内,发现很多带有伊斯兰纹饰的唐代瓷片^⑦。伊斯兰教于公元 7 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兴起,8 世纪中叶随阿拉伯帝国(大食国)扩张而不断吸收被征服地区(包括希

①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6年 1 月。

② 《欧亚大陆交流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年。

③ 金华地区文管会、武义文管会《浙江武义陶器厂三国墓》《考古》1956 年 1 期。

④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56 年 1 期。

⑤ 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56 年 1 期。

⑥ 法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6 年 1 期。

⑦ 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

造型相近,此壶口部有流,束颈,鼓腹,喇叭形圈足,底施联球,弧形柄上端与口连接,并施一胡人头,另一端与腹连接,属粟特产品。这类壶在中亚、西亚常见,是代表性作品^①。苑愿世纪传入中国后很快就用瓷烧制出来。还有河北蓟县出土的青瓷龙柄凤头壶,为唐代制品,壶口与盖结合起来塑成,凤头盖的一端与壶结合成上下嘴,细长颈,椭圆腹,高圈足,呈喇叭形。通体由数组弦纹隔成不同的装饰区间,分别饰以联珠、忍冬、莲瓣、流云、人物、葡萄、宝相等,柄为龙形,龙头伸向壶的口沿,前肢抚着肩部,后肢抓住底座,造型美观,通体施青釉,胎质细腻坚硬。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马洛斯曾出土一件唐白瓷凤首执壶(见缘年印度尼西亚赠送照片),缘年在广州市瑞南路出土一件唐青瓷凤首执壶,洛阳塔湾、关林、邙山葛家岭各出土一件瓷带把凤首壶,烧制均精美。发现的数量多,传统的风味浓,可以看出其已成为生活实用品,并远销海外。还有唐三彩凤头壶,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一件,缘年在西安市西郊三桥镇唐墓出土。高猿厘米,整体呈椭圆形,鼓腹小口,壶口为凤首,凤冠较高,平沿外侈。双目圆瞪,嘴含宝珠,长颈,扁椭圆腹,高圈足,呈喇叭形,曲柄,柄两端分别与壶口、肩部粘连,腹部两侧纹饰为凤鸟纹与骑马狩猎纹。陕西省博物馆所藏一件,缘年在西安市征集,造型雷同,高猿厘米,腹部两侧纹饰为宝相花,圈足施莲瓣纹,施三彩釉。甘肃省博物馆藏一件,高猿厘米,甘肃天水市出土,与陕西省博物馆藏造型纹饰相同,不过在腹部的宝相花周围是凸出表现的珍珠底纹,与公元苑世纪初装饰翼骆驼纹的高颈带把银壶最相近^②,其差别在瓶口,是粟特银瓶传入中国后经陶瓷艺人创新而成。这种陶瓷凤首壶尚未发现唐以前的,因而可以说此带把壶是唐代创烧,已普遍应用。这类瓶(壶)又称为“胡瓶”、“带把壶”。唐玄宗曾赐过安禄山“金花大银胡饼(瓶)”,安禄山也献过“金宝钿胡壶”^③,这里所指的“胡瓶”正是这类银带把壶,当时朝廷内流行。从造型看,在缘远世纪萨珊有饰塞穆鲁纹银胡瓶,在苑世纪粟特有翼驼纹银壶,可追溯到帕提亚乃至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这类“胡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传入我国,宿白先生认为这些器物大约是中亚、

①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缘年。

② 陕西省博物馆《古代中亚艺术》,陕西旅游出版社。

③ 见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亚的输入品^①。西安市长安区博物馆藏有一件白釉茶叶高足执壶,其造型有独特之处,即高圈足,足颈上有一道凸棱。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宁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73年)李贤墓出土一件银壶,高14厘米,腹径10厘米,鸭嘴形流,长颈,器腹下部圆鼓,腹上饰有人物图,腹部装有带胡人头形把,高圈足,属萨珊银器,这类“胡瓶”在北周时已传入我国。但是长安区博物馆藏的白釉荷叶口执壶,除了口部与把饰不同外,均属高圈足^②,长安区博物馆藏的高足凸棱白釉带把壶与日本奈良正仓院保存的一件银平脱漆瓶相似,该器在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年)的《东大寺献物账》上被称为漆胡瓶^③,这类胡瓶被学者认为是波斯萨珊器。“胡瓶”中亚、西亚常见,罗马到伊斯兰时期都有发现。后来以出土器物为据,经过学者的研究,萨珊“胡瓶”绝大多数带有较细高的圈足。总之,唐代的瓷(或三彩器)带把壶发现不少,名称不一,但是造型与银“胡瓶”相似。瓷(或三彩器)带把壶的造型是受外来“胡瓶”的影响烧制的,将其细部,如口、颈、把、腹、足与外来的银“胡瓶”对照,不难发现由于所用原料不同,制瓷过程除了塑造,还要经过焙烧,因而造型的某些细部省略,或经改造与美化,因而瓷(或三彩器)带把壶与外来的银“胡瓶”有差异。从器型看,那种颈部短粗、圈足矮器是受粟特“胡瓶”影响,而细高的圈足是受萨珊“胡瓶”影响。

瓷扁壶,南北朝时期出现并流行,到唐朝仍流行,有细釉器、三彩器、白瓷器、青瓷器。汉代有铜扁壶,西安市北郊红庙坡地区曾出土过汉代河间国邸铜扁壶^④,是盛水或酒的容器,其造型不同于外出使用、侧面有穿系的背壶,而是受到了外来影响而出现。正如《中国陶瓷史·三国两晋南北朝陶瓷》载:“北朝时期的扁壶……受外来风格影响,造型别致”^⑤。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河南安阳洪河屯昆齐武平六年(公元556年)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高10厘米,扁腹,口微侈,短颈,腹体上窄下宽,梨子形,颈与肩连接外饰连珠纹一周,肩部凸起两小系,可以穿带,腹体两面横印浮雕乐舞胡人的纹饰,乐舞由缘人组成,中间一人在

① 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

②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 6期。

③ 奈良国立博物馆《正仓院展》株式会社便利堂,1985年。

④ 《西安市北郊发现汉代墓葬》《考古与文物》1982年 7期。

⑤ 冯先铭《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

莲花座上起舞,左右各圆人,以琵琶、钹、横笛合奏,击掌按拍,均着胡服,深目高鼻,神态生动,是一幅胡人歌舞的场面,与文献记载的胡腾舞相符。早在公元员-猿世纪,西域的波斯、萨珊地区就使用扁壶,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这是带有浓郁西域风格的釉陶器,在当时是直接仿烧而成。造型与纹饰是西域的,舞蹈者与所持乐器也是西域的,可以看出西域乐舞盛行,墓主范粹喜爱“胡乐”,才随葬了这样的器物。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白釉双系扁壶,高 圆厘米,腹长 圆厘米,腹宽 圆厘米,西安市西郊发电厂唐墓出土,小敞口,细颈,扁腹,微鼓,高椭圆形圈足,两侧各有系,便于携带,腹面宽,两侧各施倒垂变形莲花纹,通体施白釉,胎质土白。还有唐三彩舞乐人物扁壶,高 圆厘米,陕西省合阳县甘井乡唐墓出土,壶身扁圆,正面看像梨形,盘口短颈,肩部有两双系,壶腹部施一舞女,周围为蔓草纹,高圈足,体饰浅黄与褐黄二色釉。青釉人物狮子扁壶,山西太原西郊玉门沟出土^①,藏山西省博物馆,通高 圆厘米,宽 圆厘米,属唐代初期北方产品,口椭圆形,细颈,斜肩,鼓扁腹,圈足。口沿下有突楞纹,下饰联珠纹与并列宽肥莲瓣,肩部是如意云头纹,扁腹两面纹饰相同,正中为深目高鼻的驯狮胡人抚摸着雄健的双狮,两头狮子各蹲在他的膝前,两侧面各饰一象头,圈足饰连珠花瓣纹。舞狮子唐代有记载,当时盛行胡人狮子舞,即“五方狮子”^②和“凉州狮子”^③,是阵势很大的歌舞,由一百四十人组成,还唱“凉州词”。“扁壶”是后人以造型特征称之,其用途是明确的。从纹饰看,胡人、胡舞、驯狮均由西域而来,特别是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上的胡腾舞纹饰源于西域国家。

瓷净瓶,又称军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多件。例如西安市西郊韩森寨唐墓出土的一件高 圆厘米,腹径 圆厘米,管状口,圆肩,鼓腹似橄榄形,假圈足,肩部有一短流,通体施白釉,釉白中闪黄,足底无釉。高陵县唐墓曾出土一件白釉净瓶(高 圆厘米)。此外还有黑釉器、三彩器。圆年西安市三桥镇出土一件三彩净瓶,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通高 圆厘米,腹径 圆厘米,细管圆口,下设小圆平板,下又连长颈,橄榄形鼓腹,矮假圈足,肩有一流,流口为小喇叭形,通体施绿、黄、褐、白釉等,釉不到底,胎白质松。五代至宋,定窑

① 高寿田《太原西郊出土唐青釉人物狮子扁壶》《考古》圆年 缘期。

② 《旧唐书·音乐志》。

③ 唐·白居易《西凉使》。

烧制著名的白釉带“官”字款净瓶，河北省定县宋代静志寺塔基曾出土^①，胎洁白，釉白闪黄，底无釉，制作规整，釉洁净，高 15.5 厘米，腹径 10.5 厘米。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唐代窑址共出土各类净瓶十多件，有青釉、黑釉、三彩、茶叶末、白釉、绿彩等。《释氏要览》记载：“净瓶梵语军持，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于净手。”唐人李华《东都圣善寺无畏三碑》云：“观音大圣在日轮中，手执净瓶，注水池中。”它是佛教僧侣“十八物”之一，云游四方时可随身携带贮水，原为印度产品，随佛教传入中国。梵语为“拈雅迦”、“君达”、“军持”等，中文译为瓶或澡瓶。高僧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载其造型与用途。唐代诗僧贾岛《访鉴玄师侄》诗：“我有军持凭弟子，岳阳溪里汲寒流”，说明当时在僧侣中流行。“军持”一词又多出于西行求法僧人文章中，说明此器来源于印度佛教，例如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晋法显著《佛国记》：“法显亦以君犀及澡缸等余物掷海中。”唐代流行，1959 年西安市西郊杨家围墙北曾出土一批唐代铜器，其中有铜净瓶、铜带柄薰、铜细颈瓶等，出土地原是唐代佛教寺院遗址，还出土过石舍利棺。铜净瓶的造型与上述的定窑白瓷“官”字款净瓶相同，高 15.5 厘米，腹径 10.5 厘米，原鎏金，日久脱落。铜带柄香薰在当时佛教石刻造像中常常见到，供养人手持此器焚香表示虔诚。1957 年西安市新城内基建时发现一具唐代青石佛座，上面线刻“礼佛奏乐图”，礼佛的供养人有手持带柄香薰的^②，证实带柄香薰为佛教礼佛活动中使用的器具。1956 年扶风县法门寺塔地宫曾出土鎏金三钻杵纹阏迦瓶^③，盘口，细颈，圆腹，肩部有一曲流，圈足。上面的纹饰鎏金，属佛教色彩，圈足内墨书“南”、“北”等字样，原是放在法门寺地宫后室，四角各放一件，后是坛场做法器之一。瓷净瓶就是按佛教净瓶烧造。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净瓶是 1958 年江西省新建县乐化郭台林场隋墓出土的青釉象头瓷瓶（高 15.5 厘米，口径 10.5 厘米）。唐代许多著名瓷窑，如河北邢窑与定窑、河南巩县窑、湖南长沙窑、陕西省黄堡窑等都烧制瓷质净瓶，证明这种器物流行。

青釉折腹碗，唐代洪州窑（现在武昌）烧制。敞口，外腹中部有一道凸棱，

- ①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59 年 8 期。
- ② 姜克任《西安发现唐代礼佛奏乐图石刻佛座》《文物》1957 年 11 期。
- ③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 11 期。

弧形腹,圈足,通体青釉。还有三彩折腹碗,1956年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①,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高 苑 苑 厘米,口径 苑 厘米,敞腹中部凸起一棱,弧形腹,圈足。通体施绿、乳白花色釉,器内以白釉为地,并有十二道绿色重条纹饰,其间夹赭色细浅纹釉。器外腹以凸棱为界,分上下两段,乳白釉为地,中间上下自由扩散绿釉,整体色泽绚丽富贵。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于 1983 年在西安东郊纺织城唐墓出土一件搅胎褐色釉折腹碗,属低温陶器。“折腹碗是受西方影响的器形,折腹碗器物是西方陶器,金银器较流行的形制,折腹器对中国的影响反映在八世纪初陶器上”^②。唐代陶瓷器多模仿金银器的造型,而有的金银器模仿西方金银器,如西安市南郊沙坡村唐墓出土一件鎏金花鸟折腹银碗^③。何家村出土 圆件银折腹碗,内部分别有墨笔书写的“十五两半纯”与“十二两”,口径为 苑 苑 厘米,高 苑 苑 厘米,腹部制成折腹,可加固器身以防变形。陶瓷制折腹碗的折腹装饰,主要是造型美观,并不起加固作用。

白釉单柄杯,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 猿件,尺寸分别为:高 猿 厘米,口径 缘 厘米;高 源 厘米,口径 缘 厘米;高 源 厘米,口径 缘 厘米。1959 年潘家村新村出土 猿件造型相同。敞口,口下内收,腹微鼓,足底平,上腹的一侧设单柄,柄为圆形,柄上有指垫,柄下设一珠。釉不到底,露胎,胎质坚硬。这类杯以前少见。其柄部造型与西安市南郊沙坡村出土唐素面碗形银带把杯、何家村出土仕女纹银带把杯相似,与粟特地区 愿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圆底碗形银带把杯相同。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在唐代粟特式金银带把杯章节中专门论述金银带把杯的渊源,还提出汉晋出现带把器物,当时一直罕见,找不到与唐代带把杯之间的演变关系。唐代金银带把杯在中国传统器物形制中找不到演变的渊源,而在粟特器物中常见。将中国出土的金银带把杯分组与粟特器对照研究,有的是从粟特输入,有的是粟特人在唐朝制造,有的是受粟特器影响制造的,带有很深的粟特风格。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狩猎纹八花瓣带把银杯,从造型与纹饰看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品,应属中国制造。在西安市曲江羊头镇唐姚无陂墓发现一件带把银杯,从造型与把柄看是按当时粟特

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57年 1期。

②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③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东南郊沙坡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59年 1期。

器制造,但上面刻有中国匠人名字,即“匠郑卿”,证明唐时有的银单把杯是中国匠人学习粟特器制作的。上述獭牛白瓷单柄杯是受粟特金银器单带把杯影响烧造的,瓷杯的环形把是粟特杯形器上一个特点,环形上有宽指垫,下有圆珠,用手持杯时将食指放入杯中,拇指按在指垫上,使手指感到舒适省力,下面的圆珠起加固作用。西安市潘家村新村唐墓、河南杏园等出土白瓷单把杯,唐洪州窑也曾烧青釉单把杯,可见当时此种瓷杯较为流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还藏有白釉罐形带把杯,高 8.5 厘米,最大腹径 10 厘米,口径 7 厘米。西安市文物商店也曾征集一件同样造型的白釉罐形带把杯,型略大,圆形口,鼓腹平底,腹上部装有柄,柄与腹相连处粘有花纹装饰,这是仿银杯柄“接铆”处的装饰,施白釉,胎白,质坚硬。白釉罐形带把杯出现属偶然,与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素面罐形银带把杯、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出土素面罐形银带把杯造型相似。“考证中国出土的这件器物的时代和产地,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山羊纹银带把杯和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的科比内 8 号墓出土的缠枝纹金带杯可作参考……”。它们之间造型接近,是粟特 7-8 世纪盛行器物,都是中亚系统。何家村素面形银带把杯应是外来输入品,白釉罐形瓷带把杯就是仿此类杯烧造的,该杯的把内的特征明显是受外来影响。

莲瓣形花口碗在唐代成为常见的器型,南方著名的越窑、龙泉窑、长沙窑和北方著名的邢窑、定窑、巩县窑、耀州窑等均烧造,虽然釉色不同,但是碗造型相似。例如 859 年宁波市出土越窑青瓷带托碗,高 10.5 厘米,口径 10 厘米,托高 1.5 厘米,小碗做成荷花形,碗托做成沿微卷的荷叶形,青釉莹润,胎灰白,坚硬。在西安市北郊火烧壁出土一批晚唐时代罕见的白釉“官”字款瓷器^①,造型十分优美,有三尖瓣、五尖瓣、宽五瓣、双脊五瓣等,釉白闪青,晶莹湿润,规整,宛如盛开的白色莲花,真是“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白如雪”。这类造型的碗多出现在唐晚期及以后,冯先铭著《中国陶瓷史》记载:“到了晚唐,碗的形式越来越多,计有荷叶形碗、海棠式碗、葵瓣口碗等”。这类碗盘在唐代早期未曾发现,是受当时金银器碗的影响而制作的,按器壁造型又称多曲碗。西安市西郊何家村、西安市东郊沙坡村、西北工业大学、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陕西省铜川市背阴村、陕西省蓝田杨家沟等出土了相当丰富的

^① 王长启《西安市火烧壁发现晚唐“官”字款白瓷》《考古与文物》1982年 1 期。

金银碗等,其造型相近似。特别要说明的是 贞观元年西安市西郊出土的缠枝纹银碗^①,高 源厘米,直径 源厘米,碗体八曲瓣,花形腹微曲,较浅多棱,喇叭形圈足,足底施联珠纹,器腹内外凹凸起伏明显,碗内心有两层联珠纹,外绕以八出忍冬缠枝纹,锤击成型,花纹平饬,纹饰涂金,从造型纹饰分析,为粟特银碗,或者是仿粟特银碗造型。当时粟特手工业和商业发达,其手工业品与其他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因而粟特文化对内地影响大。由于中国人与粟特人的生活习俗与审美观念不同,中国人在使用中为适应自己的需要进行改变。多曲式碗早在公元 员世纪中亚已经使用,后被中亚粟特器工艺继承。从西安西郊缠枝纹银碗到各地出土的多瓣形银碗,在时间上有早晚的差别。而在广东遂溪边湾村南朝窑藏中发现一件多曲银碗^②,其造型为花瓣口,在银碗口沿上刻一行阿拉伯铭文。这种文字于 源-缘世纪时曾在粟特地区流行,经过研究考查应定为 远世纪器物。在山西太原发现的隋虞弘墓出土的石椁上,后壁彩画石刻宴饮图中,对坐男女宴饮,观舞图中就持多曲杯。将不同的同类银碗进行排列,可以看出这类银碗的多曲造型由多而密向少而疏发展,由分瓣凸鼓与内棱深凹向分瓣不明显发展。到 愿世纪中叶以后多曲碗为四瓣,五瓣,或更多,有的在口沿处分瓣形,在腹部不分瓣或分瓣不明显。在模仿和改造中,工匠将多曲略加改变,成为花瓣型,如同花朵的银碗在中国流行。多曲形金银器皿虽然在唐代流行,前期与以后的多曲碗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萨珊、粟特式,后者为四瓣、五瓣艺术花形,更具活力,更接近生活,把鲜花移植到日常生活品上,更具美的艺术效果,完全中国化了。唐代的瓷器花瓣型碗就是按照当时金银器烧制的,带有粟特、萨珊银器风格的中国化瓷器,唐代多曲瓷碗主要是在晚唐烧制。江南地区的越窑是青瓷器的代表,陕西省唐法门寺遗址出土一批有明显纪年的秘色瓷,确切年代是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 愿猿年)之前,即迎佛真身到大内之前,应属晚唐时期。贞观元年浙江宁波市和义路出土越窑青釉带托碗,贞观元年浙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出土的越窑青釉五瓣碗,均是唐代越窑的代表作品。直到五代、宋,这种造型的碗还在流行。在远离越窑的内蒙古哲里木盟辽国公主墓同样出土越窑秘色瓷花瓣口青瓷

① 韩保全《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几件唐代金银器》《考古》贞观元年 员期。

② 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贞观元年 猿期。

碗(相当北宋时期)。北方瓷器也是如此,例如陕西省耀县黄堡窑遗址也出土晚唐到宋代青釉花瓣口瓷碗^①,五代时期遗址中发现青釉碗、洗杯等器中,多曲型也相当丰富,有口与腹多曲,凹凸明显,与外来的多曲银碗相近,例如I型V式碗,唐式碗,十曲口与腹,圈足,内外施青釉,内底划双层菊瓣纹,壁上划卷草纹,口径 5.2厘米,高 3.5厘米,足径 3.5厘米。还有青瓷盏,阅型,唐式碗,这类碗盏数量都很多,也是多曲,凹凸不明显,仅有缘瓣,如同花朵,这明显与外来金银器碗差距加大,接近国内生活习惯。

瓷长杯,唐代流行,很多著名瓷窑均有烧造,例如长沙窑。贞观年湖南长沙窑共出土 15件瓷长杯,其中蓝家嘴遗址出土的一件,薄胎,杯口作海棠形,杯心印莲花,喇叭形圈足,施青色釉,器高 2.5厘米,最大口径 5.2厘米,底径 3.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越窑青釉海棠式长杯,高 2.5厘米,口纵 3.5厘米,口横 3.5厘米,足径 3.5厘米,敞口,斜腹,圈足外撇,在口沿外稍稍内收,腹壁也呈弧线下收,整体造型规整,线条流畅,酷似一朵盛开的海棠花^②。还有贞观年浙江省临安县晚唐钱宽墓出土“官”字款白釉海棠长杯,高 2.5厘米。杯口平面呈近似椭圆形,弧形浅腹,腹壁有弧形内凹棱,喇叭形高圈足,内外施满釉,瓷胎质白。在陕西省耀县黄堡窑出土两件青釉长杯(唐式碗^③碗),均残,椭圆形,近似耳杯,敛口,口沿四曲,腹部横曲,内外施满釉,釉色青绿,有开片纹,玻璃质感强,底上有钉支烧痕,长 3.5厘米,宽 2.5厘米,高 3.5厘米^③。当时著名的北方邢窑、定窑等都烧制。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一件玉八瓣形长杯与水晶八瓣形长杯。故宫博物院藏玉人物纹长杯,高 3.5厘米,口径 3.5厘米,玉质呈青色,局部有白斑,口为椭圆形,腹下收,底有圆形足。腹外阴线刻人物,衣着分别为褰衣、博带衣,盘腿坐或跪踞于席,作饮酒畅谈状,近足外饰卷草云纹一周。这类杯还有青铜、玻璃等器,银质长杯多见,在陕西省有西安市城区出土的鸿雁黄鹂纹银长杯、双鱼荷叶纹银长杯、摩羯纹金银长杯、鸚鵡纹银长杯,耀县背阴村出土一件银长杯等。在唐代李寿墓与懿德太子墓、房陵大长公主墓的石刻棺槨和壁画中有侍从手持长杯图,其出现与流行时间应是 7世纪中叶以后到 8世纪,在金银器长杯中分瓣为竖向“分瓣”式与横向“分层”

① 陕西省考古所《唐代黄堡窑址》、《五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

② 汪庆正《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

③ 陕西省考古所《唐代黄堡窑址》、《五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

式,唐代流行,备受上层贵族的喜爱。《中国圣火》一书的《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舞乐图散记》一文与《唐代金银器研究》中的《萨珊式金银器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流传和演变》一文中介绍,在我国新疆库车克孜尔第 7 窟主室顶源世纪(十六国时期)壁画中,供养人手持的长杯是我国发现较早的,还介绍在山西大同南部北魏遗址出土八曲银长杯并研究论述长杯的发展。“从中国出土的遗物和上述学者的研究,我认为多曲长杯是产生、流行于萨珊的银器”。在出土北周、隋时期的安伽、虞弘、史君等墓的石榻屏风与石椁上雕刻图中就有手持长杯的中国舞乐饮宴。这类银杯传入我国后为了适合习俗与实用逐渐改进,形成一类“曲瓣不那么明显凸鼓,曲瓣减少至四曲”的造型。唐代中晚期流行的金银器长杯是受萨珊影响,制作并经过艺术改造,上述发现的银长杯均是带萨珊风格,瓷长杯是仿金银长杯烧制的。

白釉双柄壶,高 7.5 厘米,口径 3.5 厘米,底径 2.5 厘米,最大腹径 5.5 厘米,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唐墓出土。盘口,细颈,斜肩,上鼓腹,下腹收,平底,在肩上有双龙柄相对应,嘴衔口,施白釉至下腹,这是唐初盛行的器皿。还有三彩双龙柄壶,陕西省博物馆藏一件。从考古资料中看,在隋唐以前未见此类的壶,也不见它有演变发展过程与来源,但从壶体部分和柄看,与当时的鸡头壶相近,若把鸡头壶的鸡头流改为龙头柄,与相应的柄对称,即双柄壶;双龙耳瓶的器形也同样可以看出是在鸡头壶的基础上吸收了外来胡瓶的特点^①。这是一个突变,从实用角度与传统观念看,不是中国人的习惯,它是受外来影响形成的,造型美观,挺拔端庄,带西域风格。鸡头壶是三国末年越窑、瓯窑的一种新产品,以后江南各地瓷窑都有烧制,鸡头壶是在罐子的肩对应装饰鸡头与鸡尾,鸡头系实心,均起装饰作用。东晋时期壶身变大,前装鸡头为引颈高冠成为流,尾部改为圆股形把手,上端粘在器口,下端贴上腹。到东晋中晚期,在把手的上端饰龙头。南朝器身修长,更偏于实用,隋、初唐时期,其演变趋势为鸡头由小到大,趋向于写实,壶身由矮小到瘦长,系的形式由条状到桥形等,这时的鸡头壶壶身较南朝更为瘦长,壶口更高,颈更细,鸡头为公鸡打鸣状,柄仍保留南北朝时期的龙形柄。鸡头壶主要在南方流行,到隋与唐初南北均流行。西安地区隋大业四年(公元 605 年)李静训墓出土的鸡头壶与杭

^① 冯先铭《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

州灵隐寺香料厂初唐墓出土的鸡头壶为代表作,是中国传统的器物。中亚地区木鹿发现一座大型方砖坯建筑的佛教“* 堵坡”,同时还发现一件高 源厘米的双耳陶瓶,属 远-苑世纪,上面施多色彩画,内容为盛宴、狩猎、生病与出殡的场景。从人物形体、脸型、衣服、绘画技巧看,与古代中亚绘画一样,双耳(柄)的上端接口沿下,下端与肩部相连,耳(柄)近口沿处有一圈凸起。“都使我们得以确信,木鹿的彩绘陶器是当时生产的,并不是从某个萨珊王朝统治区输入的”^①。双耳(柄)瓶在当地使用较普遍,早期也曾出土,如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意大利出土墨绘式彩陶双耳瓶 圆件(高 猿厘米与 猿厘米,公元前 远世纪),巴黎国立珍宝馆藏意大利岛尔西出土墨绘式彩陶双耳瓶与红绘式彩陶双耳瓶(分别高 猿厘米与 缘厘米,公元前 远-前 缘世纪),可以说在中亚很多地区使用,并源远流长。隋、初唐时期传入中国,很快被吸收,与鸡头壶结合形成一种新造型的壶,还有一类双腹双柄瓶(壶),出于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公元 远年)李静训墓,盘口,长颈微缩,双腹体即双联,下部各收,平底,双柄为龙首形,其衔瓶口,下与双腹的肩部相连,通体施白釉,造型奇特,是由单腹瓶变化而来,从柄(耳)与腹看,单腹与双腹为一类产品。

塔式罐,一般是由盖、罐、座三部分组成。塔来自梵文,汉语音译为“* 堵坡”或“浮图”,原是安放高僧遗骨之用,以土、石、砖、木等建成,作为供养人崇拜的建筑物,后为象征佛教的一种建筑物。佛塔起源于印度,随佛教传入中国,并作为佛教三大建筑(石窟、寺院、佛塔)之一在中国南北盛行,其建筑造型多样。塔式罐是仿照覆钵式塔做成,从印度桑奇* 堵坡看,主体是近似半球状覆钵,其下部有供礼拜用的附阶,再下为基座,在覆钵之上有方形的平头神邸,上立刹轩,轩上装伞盖。 缘年在陕西黄堡镇古窑址出土黑釉瓷塔形罐,通高 缘厘米,径长 苑厘米,器盖为七级宝塔形,顶塑一小猴,罐为翻沿圆唇,短颈,肩腹圆鼓,下腹较长,平底,底座的边沿砌成不规则的多边形,在罐的下腹部堆贴长叶状花瓣一周,底座四周捏成壁龛状,内塑有人物、佛像、花卉等装饰,这种瓷质的塔罐少见。在唐代墓葬中发现陶器的较多,作为随葬品,造型分为三部分,中部为圆形罐,上为圆盖,盖纽为多级塔形,下为束腰圆形座,底呈喇叭型,通体彩绘,一般绘莲花、宝相花和大朵流云,也有人物,器

① 陕西省博物馆《古代中亚艺术》陕西旅游出版社。

型演变规律。西安市考古所藏一件红陶塔式罐，中间的罐腹浮雕狮首与羊首各三。盛唐时期出现三彩釉塔形罐，制作精美，陕西省博物馆藏有猿件。其一是三彩四孝塔式罐，高 34 厘米，1974 年咸阳市契芯明墓出土，顶作宝珠形，罐体腹有一道凸棱，下浮雕四兽面，其上雕曾子抚琴悦父、董永卖身葬父、郭巨卖儿养母、曾子汲水济母四孝画面，通体施三彩釉，红陶胎。其二是三彩塔式罐，高 23 厘米，1952 年西安郊区中堡村唐墓出土，上部是一个高耸的带圆锥纽盖。其三是同墓出土的一件高 24 厘米的塔式罐，与上述造型相似，仅是罐腹部没有装饰。从造型与纹饰看，是印度风格佛塔与中国儒教传统纹样相结合。这种具有浓厚的佛教装饰风格的塔式罐，是当时新的品种，塔式罐多是彩陶，主要出土于唐中宗至唐末的墓中，属随葬品。

瓷高足杯，在古代瓷器中发现较为丰富，古瓷窑址中出土数量也多。例如湖南长沙窑^①，包括枫树嘴、兰岸咀、王田坪、都司坡等地窑址都出土了一批残高足杯，其他窑址也发现高足杯，说明当时大量烧制。长沙南部 醴陵 窑址出土晋代青瓷高足杯，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山西太原隋代斛律切墓、广东英德唐墓、湖南长沙市黄土岭唐墓、山西太原南郊唐墓（醴陵）均有出土。从考古资料看南方出土的较北方多，高足杯用瓷烧造在唐以前发现很少，在唐代及五代、宋、元、明、清各代都烧制瓷质高足杯。高足杯在西方罗马帝国时代已广泛使用，在《三国志》、《西汉书》、《旧唐书》、《新唐书》中均有记载。中国出土的银质高足杯是受罗马——拜占庭影响的，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对此多有论述。唐代墓葬出土的金银高足杯，有的是西方生产的，有的具有很浓的西方风格，也就是说在制作过程中，不是全然地接收、仿制，而是适应本国人民的喜好而改进，呈现一种新的风格，包括纹饰与装饰内容。仿制外来的高足杯除银质外，还有铜、玉质的，瓷质则最多。“总之，高足杯最初是罗马风格的器物，拜占庭时仍沿用。唐代的高足杯类，可能源于拜占庭的影响”。同时“中国通过南海与罗马——拜占庭交往历史悠久，因此隋唐时期中国南方出土较多的陶、瓷、铜、锡高足杯，均是仿罗马——拜占庭同类器物的可能性更大”^②。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出现不同质料的高足杯，如秦阿房宫遗址范围内

① 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书中称海棠形高足杯。

②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郭胜村唐墓》《考古》1952 年 1 期。

的小苏村出土一件秦玉高足杯,另外广州市南越王墓与广西各出土一件玉高足杯,这獭件造型相同,纹饰也相近。1957年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出土獭件鎏金高足杯,对高足杯的源流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隋唐时期的银高足杯出土数量丰富,除西安地区的何家村窖藏、沙坡村窖藏、临潼庆山寺、隋李静训墓等外,外地也较多。山西大同出土的鎏金高足杯和李静训墓出土的银高足杯被认定是西方输入。远- 苑世纪初的粟特银碗上有希腊罗马神话图,人们在饮宴中手持高足杯,近几年来发现入华祆教西域人的墓葬中出土石椁与石榻围屏中宴饮图有使用高足杯,表明高足杯是外来器物,同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使用高足杯的场景。葬于唐咸亨四年(公元 672年)的房陵大长公主墓也有持高足杯的侍女图,反映高足杯传入国内后,社会上层人物已普遍使用。

提梁白瓷皮囊壶,出于西安市西郊,现藏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高 10厘米,宽 5厘米,邢窑产品。上部扁形,中间有提梁,流口圆形,壶下部饱满,平底,左右两侧有线纹凸起,有缝线痕纹,形为皮囊壶,前后两面划花纹饰。在河北省曲阳县邢窑遗址出土有此类型瓷片及残器,证实邢窑烧此类壶^①。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一批金银器中也有一件舞马衔杯提梁银壶。皮囊壶是草原游牧民族使用,又称马蹬壶、鸡冠壶、提梁壶,有铜质、锡质、银质以及瓷质等。唐代以后辽代烧制此类壶较多,是辽代典型器之一,除了周边少数民族使用外,西域也使用皮囊壶。远- 愿世纪中亚的东北地区——恰奇(今塔什干地区)、费尔干纳和土河地区(今吉尔吉斯北部和哈萨克南部),处在粟特强有力的文化影响之下,同时还受突厥人影响。在库瓦出土的一件青铜项链,上面有库别拉——印度酒神和自然创力之神的形象,印度酒神有件皮革制酒具——中亚远- 愿世纪特有的皮酒囊^②,这件皮酒囊也就是皮囊壶,它是西域驼群通过丝绸之路必需器具。瓷皮囊壶是唐代的新产品,与周边少数民族、游牧民族与西域有关。从造型与纹饰看,中国瓷器不仅善于借鉴外来文化,而且善于学习和吸收周边少数民族的有益文化,以丰富本民族的文化。

花釉瓷腰鼓,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一件,经过修复为完整器。两端呈喇叭口,中部细腰,口与腰部共有弦纹五道,通体施黑釉,上有灰白花斑如

① 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 陕西省博物馆《古代中亚艺术》,陕西旅游出版社。

流云,即花釉,又称“羯鼓”,属陕西省黄堡窑烧造。近几十年来黄堡窑发现很多花瓷鼓残片,经过整理基本上能确认瓷鼓的形制,说明黄堡窑在唐代大量烧制花瓷腰鼓^①。隋代在河南省鲁山、内乡、禹县,山西交城以及早年在河南郟县等地窑址都发现唐代花瓷产地,同时也有腰鼓标本瓷片,这与唐南卓《羯鼓录》:“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相符。从而可知,在河南、山西、陕西的唐代名窑都烧花瓷羯鼓。羯鼓原是西域乐器,唐代诸乐中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羯鼓。在唐代或更早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壁画与棺椁刻画中,常见到奏乐舞蹈者,例如西安市东郊唐金乡县主墓出土一组骑马女乐俑,演奏者分别持腰鼓、箜篌、钹、琵琶等,陕西三原焦村出土唐李寿墓石椁线刻画中有一组奏乐图,其中就有打腰鼓者,唐代形成的龟兹部中乐器有羯鼓、揩鼓、腰鼓、鸡娄鼓等,毛员鼓、都昙鼓等都是腰鼓。龟兹乐演奏时其效果或如惊风急雨,会使乐曲表现出节奏感极强的特色,因而乐舞中龟兹乐很重视用鼓。腰鼓是从西域随龟兹乐东传到中原,在中原大量烧制,可见外来音乐在当时的影响。王建《凉州行》写道“城头山鸡鸣角声,洛阳家家学胡乐。”正如《中国陶瓷史·隋唐五代的陶瓷》所载:“唐代乐器的拍鼓原是西域乐器,唐人不仅吸入唐乐,而且用花瓷烧制鼓腔,这也是罕见的,使人想到唐人的气派与风格。”到了宋代瓷腰鼓仍在烧制,在耀州窑遗址内发现源件残器,造型与唐代腰鼓相似,体有凸弦纹,内外施青黄釉,通体刻画纹,腰上刻蕉叶,喇叭壁上刻缠枝忍冬和缠枝菊花,说明到了宋代此乐器仍在使用的,成为我国的传统乐器。

唐代瓷器向海外开拓市场,从考古发掘与调查看,陆上丝绸之路通西亚、中亚等地区,海上“瓷器之路”^②通往巴基斯坦、印度、伊拉克、波斯湾及埃及、朝鲜、日本等国家,这里均发现当时的瓷片。这些瓷片记载着伟大的中国人民在陶瓷科学技术史上取得的成绩,记载着在漫长的、艰难的“瓷器之路”上,往返商贾及友好“使者”的遗迹。隋代在宁波余姚出海口发现唐代乾宁五年(898年)前后的沉船,这艘船满载着瓷器准备到国外进行贸易,却遭遇海浪袭击沉入海底。船里装的大部分是长沙窑、越窑、邢窑瓷器。证明中国的对

① 陕西省考古所《唐代黄堡窑址》、《五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

② 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上航线称为“瓷器之路”。